

唐诗的解读

从文化传统和
汉语特点看唐诗

叶 萌/著



唐诗的解读

从文化传统和
汉语特点看唐诗

叶 萌/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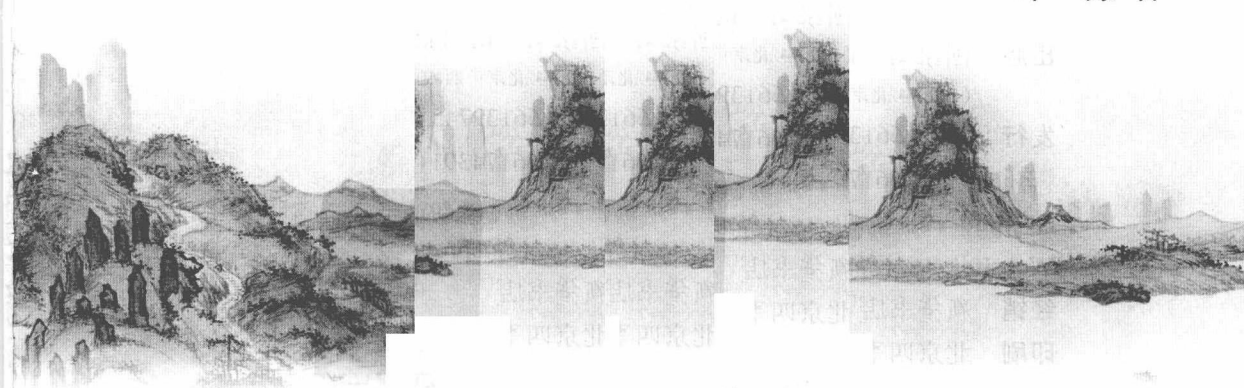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的解读:从文化传统和汉语特点看唐诗/叶萌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13-3968-6

I. 唐… II. 叶…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0908 号

书名 唐诗的解读:从文化传统和汉语特点看唐诗

著者 叶萌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

66174391(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710×980(毫米) 1/16

印张 2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0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3968-6/I·223

定价 38.00 元

本书出版曾分别得到西北师范大学
离退休教师出版基金和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经费部分资助

自序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位从事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数十年的老人,读唐诗和有关古籍的一些心得体会和感想,主要是从文化传统与汉语特点及其灵活性这两个角度,对唐诗做些初步的探讨。它不是那种教科书性质的书,面面俱到,四平八稳;也不是那种学究气十足的学术著作;它没有那么多考证,也缺乏合乎当今潮流的新词语。作者只就事论事,就诗论诗,写出自己想到的、认识到的,不掩饰,也不自文其浅陋,愿就书中所谈诸问题向广大读诗和写诗的朋友讨教,并静待专家的批评指正。

也许有一些专家学者会认为作者胆大妄为,另一些专家学者又会认为是些老生常谈。但作者可以自慰的是,他已尽力不假手第二手材料,不因袭、照搬前人和近人的成说,凡对前人之论有所取,都是经过自己的消化,融入自己的思想里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里,有一个人物曾引用过一条法国谚语:“我的酒杯尽管不大,但我要用自己的酒杯喝酒。”窃以为这种精神还是可取的。作者自知,自己的酒杯既小又旧,但也愿用自己的酒杯喝酒。

若说胆大妄为,作者于此也有自知之明。因为这本书所涉及的有关唐诗诸问题,都是关系到诗歌的演变发展,关系到汉语特点及其灵活性等重要问题,要把这些问题都讲清楚,并非易事,作者似乎有点自不量力。可是作者确实就自己所知所学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具体来说,作者在唐诗如何扩展了诗歌的题材,使诗歌的内容更丰富,又如何提供了各种不同的风格,真正做到百花齐放、为后世作出了榜样上,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尤其是在韵律和语言方面,作者对律体诗的形成过程和成熟发展,作了比较详明的论述,对唐诗在用韵和对仗上的讲究,唐诗构词和造句等问题,都有比较细致的探讨,并有丰富的例证。因此,作者期望,这本书对唐诗研究者也能提供一些参考。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唐诗是其中的瑰宝。文化传统,包括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不能漠视或蔑视的。它常常好似一种顽强的习惯势力,只能批判地继承或扬弃,要想完全摆脱是办不到的。哪怕是青年人,总会还有人对传统诗歌感兴趣,也许还想学着写点旧体诗,如果这本书能对他们有所帮

助,作者就会心满意足了。另外,本书还多次谈到唐诗在语言方面的独到之处,谈到它如何善用汉语的特点及其灵活性,从而在汉语言和语音的运用上也取得很高的成就,因而研究唐诗的语言又会在加深对汉语特点的认识和研究方面提供些资料。是不是会有语言工作者朝这方面去努力呢?但愿这不是作者的奢望。

叶 萌

2008年4月7日于兰州

目录

CONTENTS

绪说篇	1
唐诗与诗歌传统	1
一 言志与抒情的传统	1
二 唐诗对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4
汉语特点及其灵活性在唐诗中的充分运用	9
一 唐诗诸家各有特点之故	9
二 语音形式方面的创新	10
三 唐人在用词造句上的努力	11
四 对仗句在唐诗中的使用	13
五 关于探讨唐诗的一些设想	14
诗道与妙悟	17
一 从唐诗看才与学的关系	18
二 修饰和语出自然	22
三 关于想象与虚构	24
唐诗繁荣的背景	28
一 唐代诗风之盛与帝王的倡导	28
二 取士制度与唐诗	30
三 唐代的政治较为宽容于诗有利	34
四 社会风尚和前人成就对唐诗的促进	37
内涵篇	39
唐诗的题材及其扩展	39
一 感怀诗的流行和唐时的演变	39
二 怀古咏史诗的扩大	41
三 对人生短暂的哀伤及排解之道	46
四 咏景咏物诗的盛行	48

五 边塞诗与闺情诗	52
六 有关唐诗题材的几点余论	57
国事时政与社会现实在唐诗中的反映	60
一 唐诗与国事时政的关联	60
二 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67
三 对世道和社会陋习的叹惋	69
四 作诗的现实根据	73
唐诗中的理趣	76
一 对人生的感悟	77
二 诗人们的为学处世之道	79
三 诗人对时世社会的认识	84
四 明事理有新意的唐诗	85
唐诗中的时与地	88
一 诗人对时序变迁的感受	88
二 咏写各地风光	91
三 时与地并写	94
四 今昔对比与异地对比	96
韵律篇	99
律体诗的形成过程——兼论律体诗之成型不能仅归功于沈宋	99
一 五言诗和七言诗的成熟	100
二 声调对比的出现与律诗的萌芽	101
三 魏晋后诗人在声律上的探索	107
四 唐初律诗之定型不能仅归功于沈、宋	111
律诗成熟的重要标志:唐诗的拗救	115
一 律诗初起时的情况	115
二 A、B 型句的拗救	116
三 C、D 型句的拗救与起句的相对自由	119
四 七律的拗救问题	121
五 律诗不可违背的规范与绝句的变通	121
唐诗的用韵	126
一 唐诗所用的语音系统	126
二 律体诗的用韵	127
三 古体诗的用韵	131

四	古体诗的转韵问题	135
五	唐诗用韵的其他讲究	138
语言篇		145
唐诗的炼字和用词		145
一	关于唐诗的炼字	145
二	字或词的活用	150
三	虚词的运用	153
四	貌词在唐诗中的运用和发展	155
五	词语在诗中的重复使用	160
六	唐诗的构词	163
唐诗特殊的句法句型		168
一	名词性词组句	168
二	省略句	173
三	倒装句	175
四	紧缩句	177
五	兼语句	181
六	其他特殊造句方式	183
七	诗句的节奏	185
唐诗在对仗上的讲究		189
一	用对仗的开始	189
二	诗中对仗用于何处诸问题	190
三	句中对与当句对	195
四	流水对·借对·错综对	197
五	对仗在表达诗意上的作用	199
六	对仗的种类和忌讳	201
风格篇		205
诗如其人与诗人的修养		205
一	诗人的胸襟与气质	205
二	诗人的学识	208
三	儒、释、道思想对诗人的影响	210
四	避世与诗人的修养	218
初、盛唐诗的风格		223
一	初唐诗人的风格	223

二 改变诗风从陈子昂开始	229
三 李白杜甫各有千秋	233
四 从王、孟到韦、柳	238
五 高适、岑参与李颀、王昌龄	243
中、晚唐诗的风格	247
一 从盛唐到中唐的过渡	247
二 韩愈、韩门诸子与李贺的诗风	251
三 白居易、元稹与张、王乐府	258
四 中唐其他几位诗人的风格	262
五 晚唐李、杜、温、许四大家的风格	264
六 晚唐其他诗人的特点	268
意境篇	273
“有我”与“无我”——诗人在诗中的“隐”和“现”	273
一 诗不可能无我	273
二 诗人在诗中直接出面的意义	275
三 诗人不在诗中出面仍可见诗人心情	279
四 诗人的隐和现:主观语气与客观语气	282
文生于情与情生于文	285
一 诗文应出自真性情	285
二 有真情和文采方能生情	288
三 情的凭借与情和意的关系	292
即景生情与融情入景	297
一 触物兴感情随境变	297
二 移情于物融情入景	300
三 推想到夸诞而又合理的诗艺	302
后记	309



绪说篇



唐诗与诗歌传统

唐诗代表着汉语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无论从形式或内容来看,它与前代诗歌都有很大的不同,而后代的人如再写旧体诗,在形式和创作手法上又很难超出唐诗所确定的路线。从这个角度来说,唐诗开辟了旧体诗歌的一个新时代。然而唐诗不能无中生有,又毕竟是以前代的诗歌传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为此,要研究唐诗与汉语言文化的关系,还是先得从它如何继承并发展汉语诗歌传统开始。

汉语古典诗歌的主流是什么?由于叙事诗在汉民族相对不发达,名副其实的叙事诗很少,有人便把《诗经》里的《邶风·七月》和《大雅·生民》举出来充数,后代能举出的也不过《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寥寥数首。蔡琰的《悲愤诗》虽详述遭遇,但抒情意味很浓,同后来白居易的《长恨歌》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叙事诗。因此,不妨大胆地说,古典诗歌的主流是言志与抒情,谈诗歌传统时也就不能不从言志与抒情开始,而二者历来被认为是诗歌的主要或重要任务。

一 言志与抒情的传统

诗何为而作?《尚书·尧典》已说过“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话。到汉代,《毛诗序》又加以申述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故司



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什么是志？《说文解字·心部》：“志，意也。”后代常意志连文。因此，把志解释为意志、意趣，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具体到人，再具体到一定的时期、地区，志当然是各种各样的，所谓“人各有志”。孔子就曾要求他的弟子“盍各言尔志”（《论语·公冶长》）。自士大夫以至庶人，志当然有高低、大小及指向的不同。有“男女相从夜绩，至于夜半……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见何休《公羊传注》）。虽有“鸿鹄之志”，但也有“燕雀之志”，《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曾叹息说：“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就唐诗而言，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固然是志；李白向往的“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当然也是志。正如叶燮《原诗》所言：“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外篇》上）志有异，则其表现于诗也不同。乱离年间或不得志的时候，就但求苟全性命于乱世，甚至退让不争，得过且过，逃于酒，逃于享乐。白居易晚年也有过类似心情，罗隐甚至写出过“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的诗句。这都是“志”的另一种表现，不能排除在“诗言志”这一论断之外。

除言志之外，诗歌还有个职责是抒情。人皆有情，情感的宣泄有时和人的其他生理需要一样重要。《诗经》里面就有不少抒情诗，也有既抒情又言志的，因为情和志本来就有密切关系，正如思想感情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有时难以截然分开一样。情是各种各样的，有喜怒哀乐，有爱和恨；还有针对谁的问题：有对国家、对社会、对统治者的，有家庭间、亲友间，当然也有男女之间的。举凡这些，在《诗经》里都有反映。即使是《魏风》中“刺贪”（《诗序》语）的《伐檀》和“刺重敛”（同上）的《硕鼠》，以及《小雅》中的《何人斯》、《巷伯》等针对统治集团里各种丑恶现象及行为的谴责和控诉的诗，这些历来被称为政治讽刺诗的诗篇，里面也有抒情的成分，因为它们既饱含底层民众的血泪，又深刻表达出他们的愤怒。

那么，孔子对这部既反映人民的谴责和愤怒，又多处描述并歌咏男女相悦之情的古代诗歌总汇是怎么看的呢？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可见他对《诗经》是持肯定态度的。又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这句话虽然有节制情感之意，但对写恋情婚姻的《关雎》也是赞许的。在《卫灵公》篇，孔子答颜渊问为邦时

虽然说过“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的话，对于这些话恐怕也不能像宋以后的道学夫子那样去理解。首先，只怕孔子所言的“郑声”并不是指表现于语言文字上的郑卫等地区的诗歌，即《郑风》和《卫风》，而是指与雅乐对立的郑乐，也就是所谓的“靡靡之音”。古代是把音乐看得极为重要的，《礼记·乐记》云：“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和乐古代常常并举连文，这里更把礼乐政刑并列，足见乐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声音之道与政通，故《乐记》多次指出声音与治乱的关系，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毛诗序》中也提到过：“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更把诗和乐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提高到一个今人难以想象的高度。那时诗通常是可以合乐的，所以言诗常连带谈到乐，言乐也会涉及诗，但诗和乐毕竟是两回事。孔子说的“郑声”，指的是郑乐，而不是《郑风》、《卫风》里面的那些诗章，也不是那些让后来的正人君子迷惑费解的爱情诗，因为这些诗也是《诗三百》中的一部分，如果孔子也否定它们，那就同他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话自相矛盾了。另外，“郑声淫”的“淫”字，恐怕也和今天对“淫”字的理解大不相同。“淫”就是过火、流荡，孔子只是担心“郑声”这种过于流荡的“靡靡之音”会使人忘掉用于宗庙祭祀等大典的雅乐，会像善于巧言的佞人一样蛊惑人心而已。他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也是这个意思。

关于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意义，以及何以要学诗的道理，孔子也讲过一段很有意思、后来常被引用的话。孔子教育他的门人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段话表明，孔子是很重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认识上的价值的。“可以兴”，是说可以启发人，可以使人联想到许多事；“可以观”，是说可以观览，从而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他还说“可以群，可以怨”，“群”，大约就是允许群众对诗和诗中反映的事互相议论；“怨”，就是让老百姓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愿望。从《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引郑（康成）曰：“观风俗之盛衰”；又引孔曰“群居相切磋”；复引孔曰“怨刺上政”来看，我们的理解大致可与前人最早的解释相通，如果前人那些解释不错，又有帝王能照办，那就比后世那些限制民众的言论，甚至偶语诗书者要弃市的帝王，不知要开明多少倍了。



凡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归根究底,总是这样那样地与言志抒情有关,诗尤其是如此。故自从有了关于诗歌的论说之后,其议论总离不开言志与抒情二者,孔子有关诗的言论,其实也是从诗的这两个主要职责出发的。他的教导自然更会得到后代士人的广泛尊信,对后世维护诗的传统,肯定诗的教化作用,影响很大。

《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后文又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的话本来是跟《书》、《乐》、《易》、《礼》、《春秋》对比而言的,这里的“诗”当是指后世所谓的《诗经》,可是后世学者却把“温柔敦厚”看作普遍的“诗教”,并推广成为所有的诗都应该达到的要求了。《诗三百》既然被尊为“经”,这样推广可以理解,问题在于,“温柔敦厚”究竟指的是什么。孙希旦《礼记集解》谓“温柔,以辞气言;敦厚,以性情言”。“辞气”,虽不要求像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温柔,但不要谩骂、叫嚣、喊口号,那还是正确的;“性情”,也许是指诗能改变人的性情而言,能敦厚,当然好,但敦厚不能是一个人性情的全部。总之,温柔敦厚不该是逆来顺受、不敢言、不敢争的借口。诗可以讽刺,可以怨,这是古代的帝王和圣贤都容许的,故《诗经》里就有《硕鼠》、《巷伯》那样算不得温柔敦厚的诗篇。

那么,唐人是怎样继承言志抒情的传统,对“兴观群怨”和“温柔敦厚”等问题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二 唐诗对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唐代在南北长期分裂之后,在隋末大乱之后而终于完成大一统,曾开创了封建时代所罕见的太平盛世,其后又几经变故,逐渐衰落,直至灭亡,历时近三百年。生活在这一时代中的诗人,其思想、志趣变化很大,甚至仅在其覆亡前的几十年间,也还有很多变化。诗既以言志为主旨,诗人们在言志时不能不把他们的感受、感想都表现出来,因而唐代诗的题材空前扩大了,其内容更加丰富了,风格也更多样化了。这时候,诗的作用也与以前有所不同,不只是“兴观群怨”了,而是有了世俗的、现实的用途。能诗才可以应试;求荐举时,得有诗卷去投赠;甚至交际应酬、送别留别,乃至宴饮聚会、游览行旅、鉴赏文物……处处都用得着诗。这时,又恰好是各种律诗定型、成熟起来的时候,诗有法度可寻了,汉语也更加成熟丰富了……这一切,使唐代成为一个空前的诗歌盛世。

胡应麟在其《诗薮》中,对这一盛世的格局作了比较全面的述评。他说: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备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浮、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备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缙流、羽客，靡弗备矣。（《外编》卷三）

简言之，是大家都来作诗，各种体裁、各种风格都有，而且都臻于上乘，以致唐代许多诗人的作品，都被后代奉为圭臬。在这一时代定型下来的律诗、绝句，其格律、用韵，沿袭至今，凡作旧体诗者都不得违背。甚至其句法、词法、各种修辞手法，也传承至今。虽然早就有了词，有了曲，近代还受到白话诗、欧化诗、自创的新体诗的冲击，但作旧体诗者仍大有人在。盛兴于唐代的格律诗的生命力何以如此顽强？这难道不很值得深思，很值得加以研究么？

唐诗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当然有其理由。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引用过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是现实的。

照恩格斯看来，这个命题并不是为一切现存的事物祝福的，例如为德国的专制制度祝福。既然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那么，旧体诗（特别是格律诗）的存在，是否仍具有必然的现实属性呢？

可以说，以唐诗为代表的旧体诗是具有这种必然性的现实属性的。

文化具有传承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从天而降，也不可能突然消失，除非这个民族灭亡了。我们不妨说，唐诗是汉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为文化发展到这时，恰好遇上了一个相对安定而繁荣的时期，而且无论在思想方面或语言方面，前代事实上已为唐诗的出现作了准备。关于语言方面，可以说，唐诗的格式和语言是汉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事物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必然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会产生某种或某一些程式，昆曲和京剧就是这样。律体诗的定型及后来被广泛采用为诗的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格式，也是这个原因。下文将进行详细讨论，这里只先简略地谈诗在思想内容方面，在言志和抒情方面，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和发展。

唐王朝继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和隋末的混乱局面之后立国，其统治除个别时期（如武则天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以维护其统治时）以外，一般都比



较宽松,士民的思想也较为活跃。在那样的时候,儒家思想虽已成为正统思想,但也很难完全约束住士人。王绩由隋入唐,可算得上是第一位有些成就的初唐诗人,但他说:“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赠程处士》)。后来李白也说:“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杜甫为人较谨严,其思想也最像个儒生,可是他不但慨叹“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歌唱“酒中八仙”,在《醉时歌》中还说过“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的话。据此可知,唐代有一种狂放不羁的风气,一种与后世崇尚礼教的道学家和正人君子格格不入的风气。这种风气在唐人的诗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后面专门谈“诗人的修养”一章中,我们将再对诗人所受到的老、庄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加以探讨,这里不妨冒昧说一句:能代表唐人的思想和文化的,不是韩愈的《原道》等著作,也不是什么官方文献,而正是唐诗。

这种杂有非正统思想的唐人的思想和文化,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其来有自的。被尊为经的《诗三百》里,便已有了不少描写男女相悦的爱情诗。《召南·野有死麕》就有“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龙也吠”这样的话。这明明是写男女幽会的诗,《毛诗小序》只好说是“恶无礼也”来维护礼教,后儒也跟着这样解释。再如《唐风·山有枢》云:“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这明明是讽刺守财奴不知就现有条件享受生活的诗,《毛诗》却硬要牵扯到政事,说这是“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政荒民散,将以危亡”的诗,大意虽不错,却缩小了此诗的普遍意义。《唐风》还有首《蟋蟀》,其首章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毛诗》亦以为是“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这篇诗是否只针对晋僖公虽难以断定,但意在劝勉人既应快乐地过活,又不宜太过,要想到自己的职责,与《山有枢》含义可相通,疑都是普通士民表白他们的心情心态的诗,不一定与统治者有什么关系。总之,《诗经》里的《国风》和部分《小雅》基本上都是普通百姓歌唱自己的生活和感受的诗。有的篇章,如《硕鼠》、《伐檀》等,会对统治者有所讥刺和谴责,但也多与自己的生活有切身的利害关系。

孔子是否删过诗,迄今尚无定论。但孔子曾利用《诗三百》来教育弟子,这从《论语》中即可看出。正是由于《诗三百》被尊为“经”,后人力求从其中寻出教育意义,定要与当时的统治者和政事拉上关系,求取诗中的伦常道义方面的教训,为此不惜牵强附会,才使其中许多诗失去其本来面目。近人在

恢复这些诗的本来面目上做了很多工作,这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不理睬加在《诗经》上的各种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这些误解和曲解作为历史文献看,当然也有一定用处),《诗经》的确是一部极具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古代诗歌总汇。其中的《大雅》和《颂》主要是用于宗庙和祭祀的乐章,以及一些关于氏族来历的传闻,《国风》和部分《小雅》则反映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情景,主要来自民间,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诗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感情是强烈而真挚的,表白是朴实而直率的,不像后来文人的创作那样顾忌颇多。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后世是怎么继承这笔遗产的呢?这种传统怎么演变到唐诗,是很值得注意的。

封建的大一统形成以后,社会进步了,也复杂起来了,再加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很难形成了。诗是要言志抒情的,不免也受到影响,也许这就是除了大块文章的汉赋之外,汉诗相对沉寂的原因。两汉约四百年间,能为后世传诵、有可信作者的诗作,只有梁鸿的《五噫》和张衡的《四愁》。这两首诗显然都受到《诗经》《楚辞》的影响,在精神上也确实有相通之处,但由于它们的内容和形式都很独特,所以后来再无人踵武。

五言诗最初只出现在民间歌谣和乐府中,文人正规的五言诗直到东汉中期才有。确实可信的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就是《古诗十九首》。这些诗非一人一时所作,时代和作者都已无法考定。《文选》把它们编撰在一起,后世总称之为《古诗十九首》。十九首诗的语言风格相近,都已是相当成熟的五言诗。其内容比较庞杂,有的是友朋相忆而劝勉倾诉,有的是逐臣、弃妇、游子之辞,有的则是不得志者的悲叹,……但情调上也有类似之处,都有文人那种对人生的感悟:人世无常,应该及时行乐,好自为之。“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和“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等语可作为代表。这些诗的感伤气味很浓,对后代的影响很大。曹植伤身世、诉哀怨的诗即有所取法,可以说,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乃至鲍照的乐府诗,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其影响。即使是陶潜,以其胸襟之旷达,出语之真率自然,虽在时人中独树一帜,但精神气质上也不无十九首的影子,读其《拟古》、《杂诗》诸诗即可见,如《杂诗》中云:“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这显然也有老庄思想的影响在内。

直至六朝的齐、梁、陈时期,宫体诗盛行,文人竞逐绮靡浮艳的文风,咏怀伤世之风才有所消歇。其间虽有个庾信,由于其身世处境之不同,才有一些感愤之音,但也不能改变当时的风气。故韩愈《荐士》云:“齐梁及陈隋,众